

第一章 导论

走向女性主义诗学

美国作为新世界伊甸园的神话已经被许多人看作是美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神话。美国评论家 R·W·路易斯在他的那部极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著作《美国的亚当》中，把这个新世界的伊甸园视为“一个刚刚诞生的新天地，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第二次机会”。“而人类的第一次机会已经在腐朽的旧世界中被灾难性地毁掉了”。路易斯还向读者介绍了这个新伊甸园里的新人，他孑然一身，独立自主，以其独特的内在活力，面对生活的一切考验和磨炼。这个新人最像被逐出伊甸园之前的亚当。^①“美国的神话”——关于亚当的神话——在 19 世纪初期的美国逐渐形成，而“美国的亚当”这一人物形象则成为 19 世纪美国文坛巨匠们创作的题材。他被看作是 19 世纪美国文学中一切优秀品质的象征：纯真、独立、富有道德感和进取精神。这些品质长期以来成为检验美国文学形象的标准。19 世纪男性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珀笔下的人物皮袜子、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和亨利·詹姆斯笔下的克里斯托弗·纽曼都可以归入此类。

这个频频出现在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新世界的伊甸园，就这样成为一个由男性创造出来、完全属于男性、仅为男性而设的天上乐园。而发人深省的是，美国文学评论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忽视或否定了伊甸园里的另外一个人物——夏娃——的存在。夏娃

^① Richard W. B. Lewis, *The American Ad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 5.

因此成为被这个新世界的伊甸园遗弃了的人物。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传统的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一直受这一观念的统治和影响,19 世纪美国文学实际上成为男性文学的代名词,从而出现了 19 世纪美国文学几乎成为单性文学的怪现象。^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长期存在被美国女评论家尼娜·贝姆归结为:控制了美国文学阅读、带有性别歧视偏见的文学理论所起的误导作用。^②

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评论不断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经过女权评论家的不懈努力,今天的读者已经看到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即 19 世纪美国小说的实际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在传统的美国文学研究和学习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所谓的“经典作品”;在美国文学的璀璨历史画卷里,还有许许多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杰出作品。是这些翻卷的浪花帮助构成了美国文学的奔腾大河,使美国文学宝库更加丰富、更加绚丽、更加迷人。也是这些女性作家以手中的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更全面地展现了美国文化。由此而言,抛开美国作家的一半——女性作家——去谈论、研究美国文学的做法既失公正,也不明智。它使美国文学研究具有片面性,缺乏完整性和合理性。

同样,由于女权主义评论家的挖掘和研究,我们今天得以知道女性创作在 19 世纪美国文学中占有的巨大比例,她们无愧于那个时代的文坛“半边天”。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许多在 20 世纪前 70 年内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在她们自己的时代都曾经是驰名文坛的风云人物,是极其活跃的畅销作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女性作家的存在和畅销由 19 世纪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一封信得到了验证。这封信谴责那些“乱写乱划的妇女”,说她们作品的销售量甚至超过他本人的著作。如今,这封信几乎与他的作品《红字》

① 贝姆在其论著中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在传统 19 世纪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中,仅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和埃米莉·狄更斯两人榜上有名。而提到 19 世纪美国小说时,也只有斯托被一带而过,其他女作家则一概被忽略。

② 参见 Nina Baym, "Melodramas of Beset Manhood: How Theories of American Fiction Exclude Women Authors," *American Quarterly* 33.2 (Summer 1981): 123-39.

一样出名，频频被评论界，尤其是女性评论家们谈论和引用。1855年，霍桑曾致书其出版商，忿忿不平地抱怨道：“美国如今已经完全沉迷于一伙该死的乱写乱划的妇女。只要公众陶醉于她们的陈词滥调，我便没有成功的机会了。况且，即使我得到成功也会为自己感到羞愧。《点灯人》^①一版再版，成功奥秘到底何在？还有其他同类小说，这些小说水平不可能比《点灯人》更差，不过它们也不需要比它出色，因为这类小说怎么都能销售到10万册以上。”^②霍桑当年的牢骚今天读起来耐人寻味，因为它无意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美国女性小说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并且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它们不仅深受读者的欢迎，其高销售量和高经济效益甚至连同时代的男作家也难望其项背。

美国女性文学在那个年代的异常繁荣，正是它们不应该被排斥于美国文学研究之外的最重要理由。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却正是它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正统”和“经典”美国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初期，美国文学界通过书写文学评论和历史著作的形式为自己的民族文学进行了定义。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美国文学女性化的攻击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的认知倾向：真正的美国艺术应该体现男性文化的价值。^③也是在这一经典化的过程中美国绝大多数妇女作家被贬入冷宫，其作品也遭到尘封无影的厄运。而美国学术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撰写美国文学史的庞大项目，更是把美国文学看作是具有男性气魄的美国民族精神的体现。无论是战后撰写的文学史，还是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些美国文学批评经典著作，都具有以显现“美国方式”为宗旨这一本体论

指19世纪女作家 Maria Susanne Cummins 的畅销小说 *The Lamplighter*。

^② Nathaniel Hawthorne, *Letters of Hawthorne to William Ticknor, 1851-1864*. Vol. 1. Newark, NJ: Carteret Book Club, 1910, p. 75

^③ Paul Lauter, "Race and Gender in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Literary Canon," *Feminist Studies* 9 (1983): 449.

的特点。^① 而这一做法的必然结果是把女性文学置于了经典作品之外。

美国学术界摒弃女性文学的做法有二。其一是采取否认其价值走向的方式。如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评论界建立了一个美国新伊甸园的神话，这个神话以亚当为中心，把独立自主的个人与腐败的文明社会的冲突加以理想化和理论化，其结果便是经典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宣扬的那种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的观点。从库珀到吐温，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男主人公们总是试图逃离社会，摆脱家庭和妇女的束缚，在一个单一性别的宇宙之间完成自我成长和定义。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与腐败的社会环境相对抗，最终逃离文明社会的走向。而这种走向被男性评论家们视为一种“美国化”的表现，定义为美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最终成为衡量、鉴定美国文学作品的标准。美国女评论家尼娜·贝姆在其评论文章中就这一现象作了深刻的阐述。^②

如果以这些批评原则和标准来阅读和评论妇女作家的作品的话，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女评论家简·汤普金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人们用衡量霍桑小说的同样批评标准来衡量苏珊·沃纳的作品，她的那些作品自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③ 因为人们阅读、解释和衡量文学的方法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与女性文学，即那些

^① 参见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1950); 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1941); Charles Feidelson, *Symbo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953); R. W. B. Lewis, *The American Adam* (1955); 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1957); Daniel G. Hoffman, *Form and Fable in American Fiction* (1961) 等等。

尼娜·贝姆在她的文章“Melodramas of Beset Manhood: How Theories of American Fiction Exclude Women Authors” (1981) 中分析了美国评论界摒弃女性作家的原因，指出早期的男性评论家在作品中寻找的不是一种优秀的标准，而是一种美国式的标准 (standard of Americanness)，这种美国式的标准构成美国作家精湛艺术技巧的基本内容。作家在写作中必须专门展现关于美国的经历和特点，从中得出关于美国经历的普遍意义和结论。

^③ Jane Tompkins,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xvii.

所谓的感伤小说所代表的文学观和价值观相对立的文学批评原则上面的。根据这种批评原则，19 世纪女性作品的畅销并不代表这些作品具有普遍意义，也并不说明它们反映了美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只有男性作家从男性视角描绘人生经历的作品才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这种作品的普遍性成为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评判标准。而尽管那些女性作家生前享有文坛盛誉，她们的作品因为未能、也不可能从男性视角描绘人生经历，而在美国文学史上被排斥在“经典作品”之外。

美国评论界排斥女性文学的第二种做法是在为男性作家树碑立传、大肆宣扬的同时，把女性文学划归为“次类别”。在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里程碑——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之间我们还看到“感伤小说家”“区域作家”“乡土作家”等名称。这些文学批评词汇的使用和类别的划分实际上是用来作为某种价值评判标准的。譬如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往往就是一种正面的、带有褒义的名称，其麾下囊括了像霍桑、梅尔维尔、坡、吐温、詹姆斯、克兰等男性作家，而且还使得他们位于美国文学发展的中心地位，而用“感伤小说家”“区域作家”“地方色彩作家”这些名称冠于一部分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做法，不仅暗示了这些作家创作的局限性，也把他们置于文学与文学批评边缘的地位。

早期的文学批评，尤其是男性文学评论家的文学批评，甚至很少涉及到女作家的作品，即使偶尔谈到，也往往是片面的和带有偏见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谈论女性作品的评论著作中，不可不提到弗雷德·路易斯·帕蒂对于当时的文学评论标准在方法论上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的著作《女性化的 50 年代》。^①作为 20 世纪第一部聚焦于上一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帕蒂著作的代表意义在于他采用了一种有众多追随者的批评方法，往往从作者的性别入手，并且把作品视为其生理结构和生活经历的延伸。其次，如 20 世纪 70 年代

^① Fred Lewis Pattee, *The Feminine Fifties*.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1940.

之前多数的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他把讨论作者的意图作为主要目标，继而把这些作者的意图定义为有害的、混乱的或是逃避现实的。而他对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女性作品中过度情感流露的看法，则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文化偏见。在谈到 19 世纪 50 年代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时 帕蒂指出：“在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女性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她们被赐予一个女性梦想中所拥有的一切，除了一个例外，即她们的‘权利’。女性正是为了这些权利奋起反抗，而她们的反抗把 19 世纪 50 年代变成了一个文字的战场。”^①帕蒂在此暗示了女性要求权利的斗争是不理智、非理性或是过分的。帕蒂这种文化偏见在 40 年代另一部有代表性的评论著作，即赫伯特·布朗所著的《美国的感伤小说》中也得到充分展示。^②布朗把这些女性作家统统称作感伤小说家，把她们的小说看作是对“女性领域”和对于那些顺从忍耐、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等保守和传统的女性观念的颂扬。同时，布朗也把女性作家的作品定义为“情感的逃避主义”，认为她们在艺术创作上强调了情感，既逃避了时代的经历，也逃避了对于美国历史和理想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其他男性评论家对于 19 世纪的女作家也不无贬抑之谈。譬如，亚历山大·考伊把感伤主义作家作品视为“起到了一种善良的道德警察的作用，其规则主要归为宗教和道德两大类”。^③而莱斯利·费埃德勒更是毫不客气地把世纪中期的女作家称为“纯粹的家庭情感商品供应商。”^④

与这些作品观点相左的是早期的一些女性评论家的作品，她们在 20 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向男性文学评论标

① ibid, p. 92.

② Herbert Ross Brown, *The Sentimental Novel in America, 1788-186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0.

③ Alexander Cowie, "The Vogue of the Domestic Novel, 1850-1870,"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41 (Oct. 1942):420.

④ Leslie Fiedler,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60, p. 257.

准发起了大胆的挑战，公然宣称 19 世纪女性小说颠覆了男权社会价值观的观点。例如，早期女性批评的激进派代表海伦·韦特·帕帕施维利在其 1956 年出版的评著《所有的幸福结局》中采取了与男性评论家截然对立的立场。她毅然把 19 世纪中期的女性作品宣称为女性的反叛行为，强调它们鼓励一种“如此悄悄地残忍、如此微妙地恶毒”的女性行为，相比之下就连那些参加过塞尼卡妇女大会的妇女看上去也像是天真无邪的天使。”她还笔锋犀利地指出，这些作品是“由妇女酿成并用来摧毁其共同敌人的毒汤毒药”，^①因而起到了颠覆文化的作用。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帕帕施维利为妇女作品大声疾呼，但她对于女性作品的分析也来自她对于它们的一种固定的假设，即 19 世纪的女性作品代表了女性试图成为占优势性别的努力。女性作家以差异为名，否认了男性秩序，并颂扬了女性本质。这些作品中所宣扬的女性道德优势因而成为削弱男性霸权的谋略。正因为如此，帕帕施维利视这些作品为女性对于男性的厌恶与仇恨的激进评价。其实把男女二元对立视为女性作品的基本内容，不仅陷入了本质论的窠臼，也因忽视 19 世纪女性作品的丰富内涵而对它们缺乏全面公正的评价。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另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安·道格拉斯的《美国文化的女性化》。^②其实道格拉斯在这部论著中对于 19 世纪女性文本的分析极少，而主要是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角度讨论了消费社会里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从一方面来说，道格拉斯的论著开辟了对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她把 19 世纪女性文学视为现代消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因素，同时，她又把 19 世纪美国文化女性化这一文化现象归于清教道德观的衰落、感伤主义的流行、以及女性在

① Helen Waite Papashvily, *All the Happy Endings: A Study of the Domestic Novel in America, the Women Who Wrote It, the Women Who Read I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1956, p. xvii.

② Ann Douglas,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Avon Books, 1977.

消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不良及同谋作用。在道格拉斯看来，女性作品正因为对于这种有害的文化现象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道格拉斯是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角度聚焦市场发展过程的，她的方法论使她无法对于女性文本进行有效的文学批评，从而也使她忽视了女性文本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她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女性文学所得出的结论是趋于保守的，对于女性文本中所涉及的许多社会问题也缺乏正确认识。而 70 年代初的另一位评论家安·伍德也同样持有相对保守的观点，她在自己写于 1971 年的文章中指出，19 世纪的绝大多数女作家敦促其他妇女“去模仿她们的言语，而不是她们的行为”，意即广大女性应该呆在她们的适当领域——家庭——之中。^①

随着美国女权运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蓬勃兴起，美国文学界开始了对美国文学的重新评价，美国 19 世纪女性小说在过去三十年里也重新引起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如何评价，或者说如何再评价美国文学史中被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称之为“女性文学传统”的这一部分作品对于美国文学传统的意义和特点，文学评论家们歧见纷纭。^②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在女权运动的早期对于女性文本的分歧与争论还基本徘徊于 19 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到底是宣扬还是颠覆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妇女传统价值观，但随着女权主义评论的不断深入，后来的文学评论家，特别是女权主义评论家逐渐认识到 19 世纪女性小说的丰富内涵，因而坚持努力挖掘，力图全面公正地去评价这些作品。近年来对于 19 世纪女性作品的研究已出现大量可喜的成果，而且这种研究正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1977 年，美国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发表了关于英国女

① Ann D. Wood, "The Scribbling Women and Fanny Fern: Why Women Wrote," *American Quarterly* 23 (Spring 1971): 5.

②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New York: Norton, 1985, p. xxvii.

性文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①这部作品对于后来的女权主义批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这部著作中，肖沃尔特确立了由于菲勒斯批评长期统治而被埋没、被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的女性文学传统。肖沃尔特宣称妇女一直有着自己的文学，她们作为女人的生理体验与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的心理体验使她们的写作具有某些共性，从而形成一种女性的亚文化。肖沃尔特对于女性文学在文化层面上的研究以及对于女性文学传统的强调，使她的这部作品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研究的经典作品。而肖沃尔特的贡献还在于她对于那些被埋没多年的女性作家的挖掘；她在书中向读者介绍了除奥斯汀、勃朗特、爱略特、伍尔夫等少数几位著名女性作家之外的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家。在肖沃尔特的开拓性著作之后 尼娜·贝姆的《女性小说：美国 1820—1870 年间出自女性之手及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女性小说指南》（1978）成为在 7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高潮中出现的第一部分分析 19 世纪中期美国妇女作品的研究力作，对于后来 19 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功不可没。这部论著的面世对于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贝姆在这部著作中以女权主义评论观为 20 世纪后期的读者介绍了上百部多年来被排除在经典著作书目之外的 19 世纪中期女性小说，并且对这些出自女性之手，又是为女性而作的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分析。更为可贵的是，贝姆质疑了当代评论界所流行的带有性别歧视的评论标准。在对这些女性文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贝姆也为这些女性小说总结出一个“普遍情节”，即这些小说都是关于女主人公在一个敌对的社会环境里历经磨难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的基本模式。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女主人公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对她的态度。在贝姆看来，这种基本模式不仅囊括，还定义了 19 世纪中叶出现的

^①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a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所有美国女性小说。根据这些分析，贝姆断言这些小说反映出“一种温和的、有限的或是实用的女权主义”。^①当然，贝姆的《妇女小说》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也难免有其局限性。因为她的分析只涉及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作家，她只对 19 世纪女性小说情节进行概括性的总结，这样反而囿限了她自己的评论范围，使得她无法把某些不符合这种模式的作品包括在自己的评论之内。

女评论家玛丽·凯利的论著《私有妇女和公共舞台》(1985)也是研究 19 世纪女性文学的力作。该书揭示了 19 世纪 12 位“文学家庭妇女”所具有的家庭妇女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双重身份和由此产生的独特经历，探讨了这些女性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凯利把这些文学女性置于历史框架之中，评述了置身于家庭领域的那种由社会规定的“隐蔽”与职业作家世界的必要“公开”之矛盾冲突中的女性作家经历，以及她们是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如此活跃在文坛上，而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又是那样销声匿迹”的原因。^②这种批评的双重性聚焦贯穿于凯利著作的全文。而她的作品中所涉及的大量传记、信函、日记及其他各种资料使她的研究超出文本范围本身。这种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方法也使我们能够从多种角度了解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以及她们与社会的关系。

贝姆和凯利的作品标志着美国文学评论领域中新型文学评论方向的创立。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涌现出大批研究 19 世纪女性小说的评论专著，包括阿尔弗雷德·哈伯格的《美国文学中的性别、幻想和现实主义》^④、简·汤普金斯的《情感设计》、尼娜·贝姆的《小说、

① Nina Baym, *Woman's Fiction: A Guide of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 1820-1870*. 2nd ed. It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8.

② 例如，19 世纪影响最大的女性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遗憾地不在她讨论之列。

③ Mary Kelley, *Private Women, Public Stage: Literary Domestic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ii.

④ Alfred Habegger, *Gender, Fantasy, and Real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读者与评论者》^①、安妮特·克罗德尼的《她面前的土地》^②、大卫·S·雷诺兹的《在美国文艺复兴的表面之下》^③、约瑟芬·多诺万的《新英格兰地方色彩文学》^④、伊丽莎白·安蒙斯的《相互冲突的故事》^⑤在内的作品都极有影响力。此外，评论文集与学术刊物中也出现了大批针对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探讨了 19 世纪女性小说的诸多方面，从而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近年来再版的 19 世纪女性作品（如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的美国妇女作家系列作品）中的前言与后记也都是颇有份量的文章。例如乔安妮·多布森在其文章中探讨了 19 世纪妇女小说的叙事策略，提出尽管这些作品在表面上遵从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传统女性价值观，但“具有反叛意义的潜文本经常与表示顺从的表面文本共同存在，这些小说因而具有一种独特的，对传统文化价值观既肯定又否定的两面性”。^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简·汤普金斯的《感伤力量：〈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文章^⑦。汤普金斯在这篇文章里高度评价了 19 世纪中叶的女性小说，声称它们代表了 19 世纪女

① Nina Baym, *Novels, Readers, and Reviewers: Responses to Fic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Annette Kolodny,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③ David S. Reynolds, *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④ Josephine Donovan, *New England Local Color Literature: A Women's Traditi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83.

⑤ 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⑥ Joanne Dobson, "The Hidden Hand: Subversion of Cultural Ideology in Three Mid-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Novels," *American Quarterly* 38 (Summer 1986): 241.

⑦ Jane Tompkins, "Sentimental Power: *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History," *Glyph* 8 (1981).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其专著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的一章。

性“从女性角度重构文化的巨大努力。这批作品因其高智力水平、远大抱负、雄才谋略而引人注目。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对于美国社会的批判比起诸如霍桑和麦尔维尔那些更为著名的社会评论家更加犀利而深刻”。汤普金斯特别强调，这些小说在自己时代的巨大成功应该正是今天引起我们对其高度重视的原因。^①

近年来的评论家，尤其是女权主义评论家，努力清除早期男权评论界的“厌女症”，不仅关注女性文本创作的自传和社会因素，也针对文本本身进行了认真的评论。苏珊·K·哈里斯著于90年代初的《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解释策略》使19世纪女性小说的研究达到了新的层次。^②在这部分析了12部19世纪女性作品的论著中，哈里斯探讨了这些女性文本的语言和文本结构，强调这些使用了“感伤小说”结构模式的文本其实被用来作为一种掩盖手法，而在这些作品主题与修辞的框架中埋置着张扬女性潜在能力的激进观点。这些描绘了女性依赖的表面故事之下还蕴藏着某些潜在情节，这些潜在情节实际上提示妇女读者，她们可以学会取得肉体、情感和经济上的独立。如此以来，这些潜在情节就削弱了小说表面情节的力量。这种置于文本中间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独立是当时社会的禁忌，而这种“颠覆性”的中间部分的长期效果则在19世纪末的女性文本中出现。哈里斯进一步指出这些对于社会期盼角色的“叛离”是可以被当时的读者所理解的，同时她们也有能力在阅读中阐释和理解埋藏在表面文章下的文本。有意思的是，哈里斯反对把19世纪女性小说这一文学类别冠以“感伤小说”、“家庭小说”、“女性小说”的名称，认为这些名称本身就使得我们继续把19世纪女性小说置于一种强调社会/性别背景的阐释方法框架之中，从而限制了我们对于这些小说的词汇、结构和主题的探索。

① Jane Tompkins, "Sentimental Power: *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 1985, p. 124.

② Susan K. Harris, "Introduction," *19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Novel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因此，哈里斯把这些小说命名为“探索小说”，声称这些小说正是探索了在被社会赞同的女性行为领域之上的延伸，而这既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也是主题上的探索。^①哈里斯在书中建议，我们应该学会以多层次的、与性别有关的模式阅读 19 世纪女性小说，这种阅读模式会使我们看到这些小说中存在的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颠覆。

可喜的是，20 世纪末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入。自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在 70 年代初波及到文学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最初是批判西方文学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女性的传统，如今则开始挖掘那些被男权文学传统遗忘的作家和埋没的作品，重新评价女性作家与作品，而且已经硕果累累。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对于西方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质疑和反思，同时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理论系统。近年来 19 世纪女性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评论家们在肯定了 19 世纪女性小说对于反映女性生存状况、提高女性意识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把批评的关注点扩大到 19 世纪女性作家对于种族和阶级的态度，探讨了这些白人女性作家由于其优越的种族和阶级地位，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19 世纪女性文学研究正在向着更加全面、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

“她们自己的文学”^②

19 世纪的美国女性小说是女性自己的文学。这些作品出自女性之手，以女性为写作对象，又为女性而作。自 18 世纪末起，特别是进入 19 世纪之后，工业革命的推动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单一的家庭经营经济扩大到集体经营经济。男性离开家庭，进入

^① ibid. , pp. 1-35.

^② 此标题借用 Elaine Showalter 的评论专著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一书的题目。

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却把女性孤立于家庭领域之中。“家庭”，这个由男性主宰，但又被社会界定为女性特有的领域，便形成了这些女性小说的主要写作范围。如果说，当代读者在阅读这些女性小说时有时会感到这个文学世界缺乏宏大的社会背景，缺乏沸腾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么正如伊利莎白·赫尔辛格等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女性作家艺术上的局限性恰恰证实了她们生活的局限性。^①在社会开拓时期，男性在边疆和海洋驰骋，在商界和政界发挥才干，妇女的天地则只有家庭。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被禁锢在她们“适当的位置上”，很少有机会体验到开发边疆、航海捕鲸，以及竞争激烈的商业生活。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才华横溢的女性很自然地把文学创作作为她们施展才能的天地，而出现在这些中产阶级女性作家笔下的无疑是她们最为熟悉的世界。这些女性作家描写了女性的生活经历——她们的追求、她们的理想、她们的压抑以及她们的反抗。这些主题适应了广大女性读者的需求，并和她们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这些妇女写作的时期正值美国男权文化统治下的社会推崇“真正的女性”的传统道德标准之时，^②其信条的中心点就是要把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禁锢于家庭之中，扮演社会所规定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并以这种无形的枷锁，阻碍妇女的个性发展。本书中所评论的 19 世纪的绝大多数女性作家，都出身于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家庭（只有黑人女作家哈里叶特·雅各布斯的生活道路与这些白人妇女大相径庭）。她们富裕的（或曾经是富裕的）家庭境况与背景为她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尽管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她们接受社会的传统价值，成为合格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而决不是用来为她们未来的职业做准备的。

① Elizabeth Hesinger et al., *The Woman Questi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38-1883*. Vol. 3. New York: Garland, 1983, p. 53.

② 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Dimity Convictions: The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1-24.

这些天赋卓异的女性如果不是其所处时代的性别歧视，极有可能像她们的父兄一样，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大有作为。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使她们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生活道路，使她们具有了职业作家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身份。她们所受的教育在她们生活的某个阶段不得已转换成谋生的手段，乃至彻底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作为女人她们被局限于私人的家庭领域，但是作为作家她们实际上试图去评判和影响并不属于她们的公共生活。用凯利的话来说，她们“是在没有头衔的情况下发挥其作用的”。^①她们还是生活在家庭这个社会所限定的小领域之中，然而她们的写作活动和作品的出版又使她们置身于一种非传统的女性生活模式，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个体。作为职业作家，她们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但是她们知道她们依然属于家庭这个女性特有的领域。尽管这些妇女从传统的家庭妇女变为职业作家，她们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家庭。19世纪的女性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她们可能，也只能把职业作家的社会角色与为人妻母的家庭角色结合起来。这也正是19世纪男女作家之间的截然不同之处。19世纪的女性作家都曾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为自己具有的这种双重身份作某种辩解，而对于她们之间的大多数人来说，促使她们扮演这种非传统角色的一个最明显、也最强烈的动机，莫过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了。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传统意义上应该担负赡养家庭重任的男人的经济支持，这些女性可能永远也不会迈出家门，踏上公共舞台。而她们手中的笔也决不会成为她们的谋生手段，她们极有可能终生都是围着锅台转，伺候丈夫照料儿女的家庭妇女。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超越传统的角色扮演又使她们达到了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单纯作为家庭妇女的女性是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种既为他人又为自我的生活道路的确是这些妇女经历的重要特点。

^① Mary Kelley, "The Sentimentalists: Promise and Betrayal in the Home," *Signs* 4.3 (Spring 1979): 438.

这些文学女性的成功值得我们深思，而她们的生活无疑又为我们今天研究那个历史时期的女性小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了解这些作家的生平对我们正确评价她们的著作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家本身的经历就代表了她们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反映了作家、作品和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这种作家和作品的紧密关系正是女性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由于这些女性的生活轨道背离了父权社会的传统模式，她们的写作又使她们超越了女性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这些女性实际上是通过她们的作品，与读者分享她们的奋斗、苦乐和成功的。她们书中的女性经历因为源于她们自己的经历而真实可信，而她们也通过小说和自身的榜样鼓舞了读者，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角色模式。既然自立自强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小说的读者就可以借鉴这些令人鼓舞的生活榜样，争取冲破环境的樊篱，改变自己的命运，取得精神甚至是经济上的独立和平等。

19 世纪女性小说是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趋于成熟的。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根据 19 世纪女性小说所表现的题材与主题特征 将其分为 4 个阶段，并分别冠以社会抗议小说、家庭小说、区域小说、新女性小说的章节标题。应该指出的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共同点是她们对于女性地位与命运的深切关注。而各章中所涉及的文本创作年代以及主题也有重叠之处，难以截然分开。这种划分原则主要是基于对 19 世纪女性创作的题材和主题的整体考虑。本书第二章“社会抗议小说”为我国读者介绍和评论了斯托和雅各布斯两位积极投身于美国废奴运动的女性作家。这两位作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她们两人分别是中产阶级白人和处在社会底层的黑奴）反映了女性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批判。这一阶段的女性小说已经表现出女性作家对于妇女地位的关注。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中所塑造的女性角色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围绕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家庭角色展开的。第三章“家庭小说”为读者介绍了 19 世纪中期极为流行的家庭小说，其中所涉及的 5 位女性作家对于女性所受到的社会性别局限表现出深刻的认识，

她们的创作也表现出两元性的特征，塑造了笔者称之为具有传统价值观的玛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与富有夏娃式的独立意识的女性精神相结合的文学形象。她们笔下的女性身负双重重担，既是称职的家庭妇女，也能在男性统治的传统社会领域里大显身手。这些女性作家已经在积极探索女性走出家门的可能性，为读者指出了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在第四章“区域小说”中所讨论的 19 世纪后期的区域小说直接反映了作为特定区域的女性生活，这里所涉及的两位作家所描绘的女性活动区域仍然是家庭和作为妻子母亲的传统女性角色，但这些作家给予变迁中社会的女性地位以特别的关注，她们以女性的特有视角描绘了社会变革中女性的命运。而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不仅常常占据话语的中心位置，她们所塑造的那些意志坚强的女性也令人难以忘怀。在本书第五章里所包括的世纪末两位作家具具有对妇女个性的强烈意识，她们以手中的笔描绘了女性在夫权社会里所受到的压抑，她们的觉醒以及她们的反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妇女作家直接对家庭这一特定的女性领域发起了挑战，对于女性所扮演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提出质疑。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品明显带有女权主义政治色彩，与当时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呼应，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最好实践。19 世纪女性走过了一条由丧失了社会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的社会二等公民到逐渐确立主体意识，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漫长道路，而 19 世纪女性小说正是这一艰难过程的真实反映。

女性文学的读者群

内战前的美国社会经历了全方位的拓展。教育的迅速普及、印刷业的不断革新和城市的迅速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发行渠道的畅通，对于一个新的读者群的构成起到了强大推动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极大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极大地减轻了女性繁重的家庭劳动负担。这个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是女性对于阅读活动的积极参与。19 世纪美国女性文盲的大规模减少使